

戴季陶 著

日本論

在「反日」與「哈日」之間的經典論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目 錄

導 讀	8
第一節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18
第二節 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23
第三節 皇權神授思想與神授思想的時代化	30
第四節 封建制度與佛教思想	38
第五節 封建制度與社會階級	43
第六節 日本人與日本文明	47

第七節	武士生活與武士道	53
第八節	封建時代「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59
第九節	「尊王攘夷」與「開國進取」	64
第十節	「軍閥」與「財閥」的淵源	76
第十一節	維新事業成功之主力何在？	80
第十二節	現代統治階級形成的起點	85
第十三節	政黨的發生	91
第十四節	板垣退助	99
第十五節	國家主義的日本與軍國主義的日本	104

第十六節	軍國主義的實際	112
第十七節	中日國際關係與日本南進北進兩政策	120
第十八節	桂太郎	128
第十九節	秋山真之	137
第二十節	昨天的田中中將	149
第二十一節	今天的田中大將	166
第二十二節	信仰的真實性	185
第二十三節	好美的國民	200
第二十四節	尚武、平和與兩性生活	212

導 讀

在中國，凡是研究日本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的《菊與刀》的，然而日本的有識之士卻認為：外國人撰寫的日本文化著作中，有一部可以凌駕於《菊與刀》之上，這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論》。

《日本論》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雖然沒有嚴密的邏輯概念體系，作者卻憑著對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見識，刪繁就簡，直取日本文化神韻。相比之下，既沒有到過日本、也不懂日語的潘乃德的日本論，不能不顯得有點隔靴搔癢、拐彎

抹角。當年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這樣高度評價《日本論》：「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要還他一個究竟是甚麼？和為甚麼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同時又做了他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不受賄託，不為勢力所左右的律師審判官。……這一種科學的批判的精神是我們應該都提倡的。」確實，假如要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尋找一個最懂日本的人，這個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屬。

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在政治主張上曾提出過比較反動的理論，即所謂的戴季陶主義，但他之所以能夠扮演首席「知日家」的角色，當然是多種機緣湊合的結果。除卻其他因素，或許還要歸功於他既是才情橫溢的文人，又是老謀深算的政客，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與知結構識。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較感性，雖然敏銳，卻容易受性情與趣味的左右，變成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政客看日本，比較現實，雖然務實，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功利化、簡單化；只有兼具兩者之長的人，才能既入乎其中，

又出乎其外，真正看破日本的廬山真面目。

《日本論》一上來就拿日本的神權迷信開刀，顯示了高屋建瓴的眼光。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創世神話這一普遍的精神現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現形態：神道與日本的國體有一種宿命性的連帶關係和與時俱進的力量，猶如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起著凝聚整個民族的作用。戴季陶這樣勾勒日本的精神史：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根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佔了勢力，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後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於是神權說又重新勃勃起來。……此時他的範圍已經擴大了許多，從

前只是在日本島國裡面主張神的權力，到得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於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

面對這樣一個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後來發生的一切，完全證實了戴季陶的判斷；另一方面，正是這種神權迷信，構成日本人「自信心」與「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勵全民團結一致、奮發進取上，起著任何東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日本在國際生存競技場上佔據了一個優先的位置。而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不思進取的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品質，最後一度陷於悲慘的絕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戴季陶一再呼籲中國人克服妄自尊大的心理，正視日本民族的偉力：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吐蕃，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對日本文化的論述深深嵌入對方的肌理，有一種令人欲罷不能、常讀常新的魅力。比如「武士道」作為神道的鮮活載體，長期以來一直被視作日本民族精

神——「大和魂」的代表，披著莊嚴而神秘的面紗，成為日本人心目中不言自明的真理，到後來連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戴季陶以洞察歷史之眼，還原了武士道的本來面貌。在他看來，武士道的產生，從根本上說，是生存競爭與家系保存的需要，當時日本藩國林立：

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裡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裡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

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更當然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

一九〇五年，也就是清朝廢除科舉制度那一年，年僅十四歲的戴季陶赴日留學，在此之前的經歷，用他的一首詩來描述，就是：「六歲學吟詩，十歲五經畢，十二至十三，廢經讀翻譯，十四任助教，十五事遊歷。」是一個少年神童的形象。據他的同學好友，日後成為他的幕僚，長期在考驗院中任參事的謝健說，戴季陶說日語

之地道，到了「在間壁房間裡聽不出是中國留學生」的程度；胡漢民在《日本論》的序中也這樣寫道：「我前十年聽見宮崎寅藏和蒼野長知兩個日本同志說，戴先生作長篇演說的時候，他的日本話，要比我們還說得好。」留日期間，戴季陶經常用「散紅生」筆名寫散文、小說和詩歌，在日本的報紙上發表。四年的留日生活，為戴季陶日後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成為孫中山的心腹部下後，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關係的最前沿，孫中山與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過戴季陶的傳達執行。日本政壇的內幕，戴季陶如數家珍。一九一三年二月，孫中山赴日本考察，戴季陶緊隨左右，一個多月裡，作為孫中山的首席日語翻譯和機要秘書，參與了孫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動，孫中山與日本首相桂太郎作過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的密談，也是由戴季陶擔任翻譯。戴季陶在日本朝野名氣之大，對日本社會介入之深，和機敏幹練的程度，只消一件事就可證明：二次革命時戴季陶流亡日本，應孫中山之命參與協助日本國民黨犬養毅的競選工作，在日本各地到處講演，一日達數十次，大受日本民眾歡迎，

差點擊敗對手。戴季陶後來曾這樣自詡：「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況的人便是我」，這並非自吹。

然而戴季陶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晚年戴季陶這樣自我檢討：「在日本養成一種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變。」確實，在血性未定的少年負笈東瀛，本身就是「一種冒險。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兩性關係寬鬆、人情豐沛、充滿誘惑的世界，長期受封建禮教壓抑，性心理扭曲的中國學子來到這裡會發生甚麼，是不難想像的。戴季陶五官清秀，風度儒雅，聰明伶俐，性情中本來富含風流的因子，出國之前一直在父兄的嚴格管教下成長。到了日本，失去家人的管教和監督之後，很快就走到放縱情慾的極端，奔放多情的性格與東瀛人情文化風土相摩相蕩，使戴季陶沉迷於情慾的世界。有一次還與一位李姓的朝鮮皇族公主相愛，深得對方青睞，差點當上朝鮮姑爺。「二次革命」失敗後，戴季陶流亡日本，已是有婦之夫的他仍然本性難改，與一位年輕美貌的護士小姐金子相愛，名義上是蔣介石二兒子的蔣緯國，便是這次

風流情事的產物。戴季陶未老先衰，陷於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機，與留日時代的放縱生活有很大關係。正如他後來反省的那樣：「這幾年來我的精神異常衰弱，都由於十六七歲到三十當中無恆心的，個人享樂的，無節制的思想和行為，狂飲縱慾過度的勤勞，和一切不規律的生活習慣，都是重大的原因。……因為我認為人是要對一切人類負責任的，社會的責任，是有連帶關係的，一個人是不能獨自存在的，有了這個良心的認識，知行不能一致，天人交戰，佛魔並行，於是憂愁之極，就弄到神魂顛倒。」而日本文化中「無常」的世界觀，對他亦有潛移默化之功。戴季陶後來多次自殺，最後亦是以自殺結束生命，表明他有櫻花飄散那樣的瀟灑。

李兆忠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專家）



第一節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確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十萬人。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於「日本」這個題目，有甚麼樣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①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志》而外，我沒有看見有甚麼專論日本的書籍。我自己對於日本，也沒有作過甚麼系統的研究，沒有較為成器的著作。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②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批評當時的政局和十年來日本所倡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十幾年來，

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地裝置起來。但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講古代的研究呢，讀過日本書，但不多，對於東方民族語言學，毫無所知，中國的歷史，尚且沒有用過一些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夠。講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實實地鑽到他社會裡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價值批評日本的書，絕不是現在的我所做到的。不過十多年來，在直覺上，也多多少少有一點支離破碎的觀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問題的時候，姑且略略的講一講，或者是大家所願意聽的。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裡去看，日本所作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



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常駐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同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

我記得從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有好些個同學，大家都不願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話。問他們為甚麼？他們答我的，大約有兩種意思：一種說日本文日本話沒有用處，不比得英國話回了國還是有用的。一種是說日本的本身，沒有甚麼研究價值，他除了由中國、印度、歐洲輸入的文明而外，一點甚麼都沒有，所以不值得研究。這兩種意思，我以為前者是受了「實利主義」的害，後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來，日本留學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學生沒有了，在大學文科的人，有幾個稍

為喜歡和日本書籍親近些。所以偶爾還看見有介紹日本文學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於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簡單。整個批評日本的歷史，足以供覬覦者參考的，依然不多見。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的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裡？他們的生活根據在哪裡？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裡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遠東地區，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係著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絕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觀察日本錯不錯，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很希望多數人批評我的錯。倘若因為批評我的錯而引出有價值的著作來，那麼，我這一篇小著，也就不為無益了。

註釋：

- ① 即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一五），字公度，他是中國近代詩人、外交家、史學家和思想家。曾擔任清政府首任駐日參贊，駐日期間，對日本社會進行了廣泛的觀察。後來他撰寫了《日本國志》，向中國人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制度。——編者註。以下註釋皆為編者註。
- ② 一九一六年在上海創刊，最初以討袁為宗旨，由當時的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其美創辦。



第二節 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各個民族，都有許多特殊的神話，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日本人向來也有一個迷信，以為他們的國體、他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哪裡都找不出來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孫，所以能夠「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自從歐洲的科學思想輸進了日本以後，那些科學家，應該漸漸和迷信離開，把這種神話用科學的研究法來重新整理了。卻是學者裡面，現在還有幾個靠迷信過日子的人，把這些神話照樣認為是一點不錯的事實。從前我有一個先生，是國法學專家，名叫寬克彥^①。論他的學問呢，



的確是淵博精深。而且從前他給我們講憲法學的時候，他的思想，確是很進步。個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啟發不少。那時他的法理學，在重法文而輕理論的當時日本法律學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後來一點一點的向迷信一邊走，近年來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而他對於這些神話，絕對不用實證的考古學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傳來的神話上，加些自己的哲學理論，使那些神話，更加神秘些。聽說在法科大學上講堂的時候，開講要閉著眼合著手，對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講完了的時候，亦復如此。細細考察起來，原來他的祖父，是神社裡的神官。他這迷信系統，就是從那裡來的。還有一個專門主張侵略滿蒙併吞中國的內田良平^②，他的父親，也是神官。此外陸海軍軍人裡面，迷信「神權」和「神造國家」這些自尊自大自圓的傳說的，不曉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來，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實日本統治者階級的宗教，卻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極力排斥佛教。為而不遺餘力的人，他們的理論，大概和

韓退之一類，以排斥外來思想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侶，絕沒有敢否認神教的。有些附會穿鑿的調和者，不是說某神即是某佛，便說某佛即是某神，這也是表現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關係，各國都常有相類似的事實的。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是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的，其實也不過是宗法社會裡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筧克彥博士說：「日本的國體，是萬邦無比的模範國體，無論到甚麼時候，絕不會有人來破壞國體的。日本國體的精華，就是古來的神道。日本國家的權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現。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現。愛神、敬神、皈依於神，以神表現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權。」這些思想本來也不是筧博士自己所發明，不過新式的法學家裡面，要算他是一個專講國粹的人罷了。

上面所講的那些傳說，不用說是發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從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輸入日本以後，外來的制度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日本的國民，不是皈依



依釋迦，便是尊崇孔子。後來漸漸文明發達，組織進步，國家的力量，也就強大起來。豐臣秀吉^③打平了國內群雄，戰勝朝鮮，日本的武功，已經到了極盛時代。德川氏^④承續豐臣氏的霸權以後，政治文物，燦然大備。傳入日本千餘年的印度、中國的思想，已經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於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發生。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山鹿素行^⑤，在這民族自尊心的鼓蕩裡面，創起一個日本古學派。這個日本古學派之學術的內容，完全是中國的學問，並且標榜他的學問是直承孔子。他對於中國儒家的學說，連曾子以下，都不認為滿意。對於漢唐宋諸家，尤其對於宋儒，更抨擊無遺，以為宋儒的思想，是破壞孔子之道的異端。但是他卻借了中國的學問來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們看他的著作，就曉得在方法上、理論上，都沒有有一點不是從中國學問得來，沒有一處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卻絕對兩樣。他是鼓吹「神造國家」、「君主神權」。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實》一本書裡面，把他的思想根據，也就發揮盡致了。再從另一方面看，日本民間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著中國思想的

影響，一方面受著佛教思想的感化，隨日本統一的國力發展，漸漸脫卻了地方色彩，生出國家的色彩。而這一種新國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學美術的陶融，賦予較為優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會性。後來日本種種進步，都要算是這一個時代的產兒。那些傳說，是甚麼東西呢？不用說，就是中國「子不語」的「盤古王開天地」、「女媧氏煉石補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說》^⑥裡面開天闢地的一段，譯了出來，別種傳說的內容，也就可以即此類推了。

天神下了一個詔書給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兩位尊神，要他把那個飄蕩的國土修理堅固，又賜他一根「天沼矛」。這兩個尊神領了詔書，站在天浮橋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裡一攪，抽起來的時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積了起來便成了一個島，這就叫做淤能棋呂島。



這一種傳說，我們從它的象徵研究起來，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觀念發生出來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徵，而這一篇文章，無非是表現「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在古代思想裡面，幾乎沒有一個民族沒有這一類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擴大起來的日本統治組織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實，絕不足奇的。

註釋：

- ① 算克彥（一八七二—一九六一），日本著名的法學家、神道思想家，他的思想對戴季陶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 ② 內田良平（一八七四—一九三七），一八九七年前後曾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日俄戰爭之後，開始鼓吹大亞細亞主義，後來成為日本右翼組織領袖。
- ③ 豐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曾完成統一大業的日本戰國末期武將，後因兩次入侵朝鮮均告失敗鬱積而死。

- ④ 德川家康（一五四三—一六一六），豐臣秀吉死後，他擊敗豐臣勢力，成為大權獨攬的大名，一六三三年他開創江戶幕府，其後數百年，日本進入江戶幕府時代。
- ⑤ 山鹿素行（一六二二—一六八五），日本江戶幕府前期學者、儒學家、兵法家，其名為高祐，字子敬，自號素行。他反對官方朱子學，認為孔孟原著才是儒學真意，開學堂傳播儒學思想，是日本古學派的開創者。一生著述頗豐，達六百餘卷。後人編撰有《山鹿素行》共八卷。
- ⑥ 記述日本最早的神話的著作，其年代及編撰者已不可考。